

川大史学·蒙文通卷

蒙文通



蒙文通 著  
蒙默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 川大史学 ·

# 蒙文通

卷

蒙文通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石坚军(特邀)  
责任校对:李 晓(特邀) 吴雨时  
责任印制:杨丽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蒙文通卷 / 蒙文通著; 蒙默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1-X

I. 川... II. ①蒙... ②蒙...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669 号

### 书名 川大史学·蒙文通卷

---

|      |                         |
|------|-------------------------|
| 作 者  | 蒙文通著 蒙 默编               |
| 出 版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
| 发 行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印 刷  | 郫县犀浦印刷厂                 |
| 成品尺寸 | 148 mm × 210 mm         |
| 印 张  | 21.5                    |
| 字 数  | 513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0 001 ~ 1 500 册         |
| 定 价  | 58.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6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王挺之 | 冉光荣 | 石 硕 | 孙锦泉 | 刘复生 |
| 任新建 | 何一民 | 何 平 | 罗志田 | 陈廷湘 |
| 杨天宏 | 徐亮工 | 郭 齐 | 彭裕商 | 舒大刚 |
| 蔡崇榜 | 霍 巍 |     |     |     |

##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王挺之 | 石应平 | 孙锦泉 | 李德英 | 陈廷湘 |
| 杨秀春 | 徐开来 | 舒大刚 | 鲍成志 | 霍 巍 |

秘 书：辛 旭

##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征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铨、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 前 言

先君子文通先生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1894年——1968年），四川盐亭人。1911年入四川存古学堂习经学，时著名经学大师廖平（季平）、刘师培（申叔）都在该校任教。先生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受知于廖、刘二氏。1915年，先生撰《孔氏古文说》，深得廖氏赞赏，即以刊于《国学荟编》，于是治经史之志益笃。1922年，作《经学导言》，廖氏见其书，不以其或违己意为忤，且大加奖誉，时廖氏已偏瘫，犹左书数纸以遗先生，未谓“蒙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谨献所疑，以待评定”。1923年，先生在中学任教已有年，复辍教去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学唯识法相之学。甫半年，作《中国禅学考》，颇得欧阳赞许，即以刊于《内学》第一期。先生天资聪颖，功底深厚，又得明师指引，故学术方面宽广，由经学入，而史学、理学、诸子，而古民族、古地理，以及释、道二藏，博综群籍，莫不窥览，甄微抉原，创获颇丰；已刊未刊稿积二百余万言。先生逝世后，诸稿经分类结集为《蒙文通文集》六卷。第一卷《古学甄微》，以《儒学五论》、《理学札记》为主，以诸子、道、释诸文副之。第二卷《古族甄微》，以《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越史丛考》为主，巴蜀民族等诸篇副之。第三卷《经史抉原》，经以《经学抉原》、《孔子和今文学》为主，史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而其他经、史学诸篇副之。第四卷《古地甄微》，以《古地甄微》为主，其他古地诸篇副之。第五卷

《古史甄微》，以《古史甄微》、《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北宋变法论稿》为主，其他社会、经济史诸篇副之。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以《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成玄英《老子义疏》、陈景元《老、庄注》为主，合严君平、王弼、李荣、王安石诸家共十种。已由巴蜀书社在1987年至2002年间先后出版。这次所选，即以六卷本为底稿，择其各方面的代表作并增补《儒学五论自序》和《略论黄老学》两文，且改正其论说脱漏而集为此册。

先生之学虽有多方，著述亦富，但先生的学术论著并不是驳杂集的零散之作，而是隐然自有中心、自成体系的整体。我认为这个作为诸学科中心的学科应当是儒学。先生的儒学论说主要集中在《儒学五论》一书中。《五论》是先生自编、自校、自跋的唯一论文集，时值先生届五十知命之年，学术文章皆已大成，虽部分篇章尚未写出，实皆已成竹在胸，而先生的儒学思想也日臻成熟，故《五论》实可说是先生儒学思想的代表作。

什么是儒学？先生在《五论·自序》的首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也就是说儒学就是修己安人之学，就是内圣外王之学。《五论》就是以这几句话为主旨来编辑的。首篇《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主要就是讲的修己内圣之学，论述了从《诗》、《书》之言性、命，下及宋明儒之论心、性、理、气；强调的是孔子之颂“有物有则”，孟子的发扬人的道德自觉性的“性善”论，《大学》之言“诚意”、《系辞》之言“知”，和陆象山的“本心”论。次篇《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主要讲的是安人外王之学，论述和强调了汉代经今文学家理想的“一王大法”，及其所体现的自孟、荀而下的“革命素王”、“民治”、“平等”思想。其他三篇则是围绕此两篇而展开。广论四篇是史学论文，也

和这两篇是相辅相成的。从《五论》还不难看出，先生之研究儒学，与清代以来很多学者或者只研究汉学、或者只研究宋学，甚至汉、宋互为水火、互相攻击者不同，先生是汉、宋并治的。但先生又很重视家法，虽汉、宋并治而绝不相混。同时，还应看到，先生之研究儒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先生说：“是编（指《儒学五论》——笔者）之作，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是“岂徒明学，亦足兴治”的。“入出于百氏，上下及千载，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坐而论之，可起而行之。”其“学以致用”的意愿是很明显的（但先生的“致用”是通过学术文章以为社会、国家之用，而不同于奔竞急仕之徒的“致用”）。\* 不仅如此，先生还说：“儒者内圣外王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学术之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这个意义就更大了。

先生这个“学以致用”的思想，并不仅限于讲论儒学，其讲论史学也是如此。先生说：“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并提出要“就国史以创立东方（历史）法则”，这与“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旨趣是迥然不同的。先生又认为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生说：“自汉而下历史之所由为一轨范者，亦先汉经说所铸成。”所以先生又说：“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因此，先生认为史学也应当是一门内圣外王之学，对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最推崇南宋时期的浙东史学，应当就是因为浙东史家既讲心性义理，又讲经制、事功，认为这和汉经今文学家一样，都是“于内圣外王之学无乎不具”的。又先生之研究历史，很重视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所写史学论著很多都是讲论制度，这和先生讲论汉经今文学重在礼制是前后一贯

的，这是经学在史学上的应用。有学者认为先生的史学是经史融会的史学，这看法是有道理的。

先秦诸子虽各家为说不同，但莫不皆求致用于世，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先生之研诸子，则重在诸子与儒家之关系，其异其同，及其相激相荡，莫不论之。而于“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更是屡屡言之。先生认为：“先秦之末，学术日趋于综合，其始也，道家、法家皆菲弃仁义，若放淫辞，而儒家则急起而拒之，自相攻伐；其卒也，法家而接受仁义者有之，道家而接受仁义者有之，各家皆崇仁义，是周季学术之一大限也。……于是儒家亦恢宏其事，悉百家之长而取之，而儒益伟，道术遂合而为一。”这就是西汉新儒学（经今文学）的形成，而儒家之所以独尊于百世，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先生于儒家之有取于墨家、法家皆各有专论。先生以儒学为中心来研究诸子的意向也是很清楚的。

近世学者莫知中国古代文化之起于多源，则民族问题实为上古史的重要问题，先生的《古史甄微》实不啻为一上古民族史，初次提出上古民族可分为泰、炎、黄三族，实为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论之嚆矢。此三族也，“及接触既久，渐以孕育新文化，及于伯禹，遂大成熟，……风、姜、姬氏融和而一，统曰诸夏”。在这以后所考论者则主要是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之关系，周边民族强梁之时则“严夷夏之防”，周边民族和顺时则“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都是根据儒学理论来处理。

先生之研究古代民族，重在民族之流动移徙，故在每部民族史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地理考证，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蒙文通先生对古代沿革地理的贡献亦很大”时，举出的作品便是考论周秦民族诸篇。后来以之结集为《周秦时代的地理形势》，打算作为《周秦民族史》的第一章，但以分量太重，附于

民族史显得很不相称，乃独立成为《古地甄微》。故先生之古地理作品实为研究古代民族的副产物。故先生之研究古代地理，与并世古地学者之就古地以研究古地者不同，重视的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地理环境，故其议论颇具特色。治古地而出之以人文视角，这不能不认为和儒家的人文思想有密切关系。

先生之治释、道二藏，似若与儒学无甚干系，然实亦大有益于先生之治儒学。先生不仅深知理学之兴“固禅者有以启之”，更洞察古代儒士之染于禅者所存在的理论弊端，皆得力于先生之深于禅学。又理学之兴有启于禅固学人所周知，而理学初起之与道家有传承关系则为学人所罕言，而言者也知之不深。及先生读陈希夷（抃）再传弟子碧虚子（陈景元）的作品后说：“观其所常用之词语，所常用之经典文句，及其思想旨要，皆全同二程。……然后知二程之学实为希夷之传。以碧虚《老子注》校之理学而研究之，于其同处可以见陈抃之精髓，于其异处亦可见儒道之终有辨。”这就较前此深入多了。这个问题可说是学术史上一件大事，先生虽未予深究，然其端倪已在，好学深思之士不难据以考核于典籍而阐发之。至于先生推治经之法以治二典则其功尤显：《中国禅学考》是清代汉学家论家法的方法，《唯识新罗学》是用清代汉学家考遗说的方法，其辑校道书则是清代汉学家辑佚校勘的方法。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先生之学确实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下面准备谈谈先生对儒学的情结。首先应提到的是先生之作《孔子和今文学》。这篇文章作于1959年，是应山东科分院历史研究所拟于1960年3月在济南召开孔子讨论会，用《儒学五论》有关篇章补充改写而成的。大家知道，前此不久的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先生都是受批判的对象；且在这时孔子是反动思想家的观点已逐渐得势，汉代经今文

学也早已无人道及，而先生却在这时站出来推崇他们，尽管文章的措辞比较委婉，但还是明确提出：“为兆民这一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原则，……今文学正是从这一原则扩充出去的。”可以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先生这样做呢？只能说是先生对孔子和经今文学的抑郁情结的顽强表现。再先生多手即拟写一篇考论先秦儒家如何通过吸取诸子百家而发展成为汉代经今文学的脉络和过程的文章，但终因世事扰攘而未果，经常引为憾事。另又多手即拟写一篇清理宋元明清理学、说明“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的文章，也因不能获得一二月之静虑而未能着笔，也常引以为憾。又自1949年就开始用语录体所写“读宋明诸大儒书，日有所记，以自验”的《理学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写到1965年初，也迫于“四清运动”的高压才不得不中止。这都不难见出先生终生学术追求之所在。说明先生确实是一位笃志于儒学的学者。因此，与其说先生是一位方面宽广的史学家，毋宁说是一位死守善道的儒学者还更贴切些。

但是也应看到，先生毕竟是出身于清末改制后的学校，还是接触到一些新文化。尽管先生外文不好，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但却也还喜欢阅读一些汉译名著，多少也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先生虽然是一位笃志儒学的学者，而同时对传统文化还知所扬弃，对于西方文化也知所择别（如先生曾说：“往昔中国文化，其应据〔马列主义〕以改造修正者何可胜数。”“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写得不错，比之只知以考据为史学者高明多了，初学读此有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多少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然后回过头来尊儒。”（笔者按：这个“尊”字只能理解为“尊重”、“推崇”，而不可理解为“崇拜”、“迷信”。）而不是“以传统的见地来尊儒”。认为“他的学术观点

往往与当时的新派思想相参差，不能仅以‘保守’或‘趋新’截然划分。在《古史甄微》等书中即处处展现一种批判眼光”。有学者更指出：“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认为是新而不旧。”先生学术成就之能被称为“博大精深”，就充分证明这点，这里就不辞费了。

有的读者说，先生的文章难读，这话有一定道理，先生写作多用文言，且行文简洁，对问题常是点到为止，而未展开论述，所以唐君毅先生也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是的，先生也认为这话符合实际。那么，这个文章背后的道理就不得不烦读者自己去领会了。李一氓先生《读〈越史丛考〉》说得好：“首先感到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自有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责任感。”“这本书没有自命为爱国主义著作，在叙述中也没有侈谈爱国主义，而前后十二节都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蒙文通教授这个《越史丛考》之所以好就在这里，抽象的爱国主义是没有的。”这几段引文所说，都捕捉住了先生在写作时所含蕴而没有表述出来的心声，李先生真不愧是一位“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读者，可感可佩。假如读先生书的读者都能像李先生这样，那就太令人庆幸了。但对这点，我就只能祝愿而不敢要求于读者了。

蒙 默

2006年5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 目 录

|                       |       |
|-----------------------|-------|
| 经学抉原·····             | (1)   |
| 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     | (53)  |
| 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      | (64)  |
|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 (80)  |
|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        | (114) |
| 漆雕之儒考·····            | (152) |
| 俘丘伯传·····             | (157) |
|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 (159) |
| 儒家法夏法殷义·····          | (175) |
| 《儒学五论》题辞·····         | (182) |
| 《儒学五论》自序·····         | (188) |
| 论经学遗稿三篇·····          | (195) |
| 理学札记(选录)·····         | (205) |
| 理学札记补遗·····           | (223) |
| 致张表方书(一九五二年)·····     | (240) |
| 致酆横叔书(一九六三年七月)·····   | (243) |
| 周秦民族与思想·····          | (245) |
| 法家流变考·····            | (282) |
| 略论黄老学(遗稿)·····        | (308) |
| 道教史琐谈·····            | (339) |
| 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节录)····· | (358) |